

前言：德語之「中國哲學」 研究的困境與出路

何乏筆*

一、跨文化動態下的哲學研究

東亞的現代化正長期且徹底地改變當今的政經結構，其中，不同的歷史線索交織而構成新的跨文化動態。在此情況下，己文化與異文化、自我與他者、域內與域外的比較邏輯顯得過時且不適當，因為曾經被視為的異者可轉變為己者，而已者甚至可能轉變成比任何異者更為陌生。這些現象不僅是抽象文化理論的觀察，更是強烈而切身的日常經驗。倘若「文化間際哲學」(interkulturelle Philosophie) 是在維持文化與文化之間的安全邊界之下進行的，「跨文化哲學」(transkulturelle Philosophie) 則是跨越文化界限，並藉由當代哲學的共同問題來開發東西哲學的歷史資源。跨文化的情境使得對傳統中國哲學感興趣的漢學家／哲學家們感到暈眩。一旦他者的異質性模糊化，己者的同一性也將面臨失去清楚輪廓的危險。以漢語所進行的「中國哲學」研究不僅受西方哲學的影響（運用西方哲學的概念），更是與「西方哲學」遭遇的產物而作為現代化過程的一部分。也因為如此，當今的中國哲學研究使得西方學者難以看到「（西方）哲學的他者」或某種「異質思想」，而只看到西方哲學的「複本」：中國哲學似乎遺忘了自己的本質，並因西方哲學的影響而陷入一種異化狀態。因此，以西方概念來探討中國哲學，容易被看成雙重的扭曲作用（即扭曲了西方哲學，又扭曲了中國哲學）。

為了能夠適當地面對現代中國哲學的「混血」性質，或許使用「漢語哲學」一詞有其意義，因為可同時包括中國傳統學說的歷史資源，以及譯成漢語的西方論

* 何乏筆 (Fabian Heubel)，本所助研究員。



著。「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無論在理論或在制度上，仍處於分裂狀態。就此，當代漢語哲學的構想本身，乃是反省全球現代性條件下之跨文化哲學及其動態的結果。然而，對西方（尤其是歐洲）的觀察者來說，要能理解東亞或中國現代化的複雜性，並脫離西方現代性的固有模式，著實不易。因此，對西方的漢學家／哲學家而言，理解當代漢語哲學的潛力以及參與它的獨特動態，便顯得特別困難。

基於此，對檢討中國哲學在德語世界的接受、討論和運用而言，可指出兩種主要目標：對現況及其歷史條件進行冷靜地分析工作，以及實驗性地做出創造性突破，因而必須積極展開漢語哲學在現代化過程中所累積的特殊潛能。德語哲學（從康德和黑格爾直到尼采和海德格）在當代漢語哲學的發展中，一直扮演關鍵角色，並且發揮長遠的影響力。但無論是在漢學界或在哲學界，德國的學術環境對這種複雜的、跨文化的哲學轉化，仍明顯缺乏因應的能力。對跨文化哲學的發展來說，德國目前的客觀條件是極為艱難的。

二、德語之中國哲學研究的困境

近幾年來，以外文（非中文）所撰寫之西方漢學及中國哲學的研究，在臺灣和中國大陸都成為相當受重視的研究領域（中國大陸設立了許多有關「海外漢學」的研究單位）。弔詭的是，歐洲的「漢學」卻同時陷入了嚴重的危機。以德國為例，對於中國哲學及思想史的學術研究面臨雙重的困境：一方面逐漸失去其漢學的勢力範圍，因為傳統的、以菁英文化的文史哲研究為焦點的古典漢學，被一種以經濟、社會、政治分析為核心的「中國研究」取代；另一方面，在「哲學」的領域中仍未開創新的發展空間。德國的學院哲學至今仍然沒有專門研究中國哲學的專任教授。最近一群年輕學者在德國哲學學會底下，建立了「亞洲哲學論壇」以凝聚力量，並企圖突破現有的僵局（大部分的參與者以中國哲學為研究焦點）。由此可知，對中國哲學的學術研究仍處於初期階段，尚未獲得制度上的承認。因為客觀條件的缺乏，近年來許多獲得此領域博士學位的研究者已先後離開德國，轉往美國或東亞尋找發展機會。

另外，在回顧過去的相關研究時，不難發現相關研究者的人數實在有限，再加上漢學從來無法提供較為專門的哲學訓練，因此中國哲學的相關研究顯得相當分散，且缺乏哲學的問題意識。到目前為止，也只有「孔子」和「老子」的部分受到比較



充分的重視，其他先秦諸子、百家，乃至宋明儒學，或佛學方面的研究仍處於初步的基礎研究。因此，有關中國哲學的討論，通常缺乏「哲學性」，所以也無法與當代哲學的脈動產生創造性的互動。為了促進這種互動，必須對中國哲學在德語世界的研究狀況進行雙方面的批判：在歷史層面和在哲學層面上分別進行批判的工作。

就歷史的層面而言，當務之急在於蒐集相關資料，以期能夠透過歷史的分析和反省，來釐清現有困境的來龍去脈。就哲學的層面而言，則要提出跨越歷史困境的另類方向。本專輯所提供的書目，無疑將對歷史研究的部分有所幫助。不過，一旦要從歷史的角度過渡到哲學創作的角度，則會發現大部分的資料禁不起檢驗。若將這些資料從德語漢學的脈絡（即是一種具有思想史和文化史傾向的古典漢學）抽出來，而使之面對漢語學術界的研究狀況，負面的評價實在所難免。然而，德語之中國哲學研究與漢語之德國哲學研究的對比，則可提供相關判斷的標準。

三、以漢語之德國哲學研究為對比

漢語之西方哲學研究的角度與德語之中國哲學研究，在結構上是指類似的歷史過程。初步的觀察的確可發現某種相似性：在今天看來，與「漢語之西方哲學研究」相關的大部分資料只有歷史檔案的價值。此資料有助於釐清中國知識分子認識西方的發展史，並理解「哲學」如何在學院中制度化。換言之，從一種接受史與翻譯史的角度看，許多資料具有歷史價值。然若就當今哲學的角度觀之，過去的「研究」則難經檢驗。但另一方面，歷史的差異是不可忽略的：單是從量來看，差異便極為明顯（有關康德的漢語研究超過所有德語的中國哲學研究）。此外，在一種廣泛接受且長久翻譯的努力基礎上（基本上，所有西方哲學的基本文獻以及當代哲學的許多重要著作，都已譯成漢語），部分用漢語進行的西方哲學研究，在專業程度上已達到和西方哲學同等的水準。然而，當代漢語哲學卻仍在成長中。或許現況讓人有所不滿，但不得忽略的是，當代漢語哲學已經將東方與西方的資源，納入到一種動態的跨文化場域之中，並預備了創造性發展的歷史條件。關鍵在於，如何更自覺地且更具系統地開發此一潛力。在此意義下，筆者認為，當代漢語哲學所擁有的可能性與潛力，不只是運用西方哲學在方法上的嚴謹與在理論上的系統性，來發展一種具有現代意義的漢語哲學，而更是透過對於現代性的反省，來豐富甚至改造「我們」對「哲學」的認知。



四、研究書目之說明

從二〇〇一年到二〇〇六年，筆者參與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的「以外文撰寫之中國哲學研究論著之中文摘要」計畫，並主持德語部分。原先的目的在於介紹德語之中國哲學研究給中文讀者，以加強中國哲學研究的國際視野。然而，在進行此計畫的基礎工作時，亦即在蒐集相關資料以建立書目的過程中，立即遇到一個基本的問題：如何界定「中國哲學」的範圍。到目前為止，「中國哲學」並未成為德語世界學院哲學的正當對象，因此沒有任何現有的學科分類可依據。經過與漢學／哲學界的學者討論後，筆者給予「德語之中國哲學研究」較為統括的界定，將有關中國思想史，以及涉及儒家、道家、佛家等相關的研究都納入書目的蒐集範圍。此外，為了突顯「中國哲學」在德語世界的多重作用，書目也包含許多非學術性的著作而納入了一些屬於新世代的、具有某種精神性的或宗教旨趣的著作（中國的「實踐哲學」在民間比在學術界的影響更為明顯）。

換言之，如果要理解「中國哲學」在德語世界的接受歷程，必須清楚意識到，在此範圍內極少嚴謹的哲學研究，然就廣泛的思想史而言，大部分的著作具有介紹的性質。此情形對進行外文中國哲學研究的計畫，顯然舉步維艱，因為大部分的資料一旦放在漢語的脈絡來思考，便毫無哲學意義，但對研究「中國文化」在德語世界的形象及其演變，卻含有不可忽略的歷史價值。然而，計畫的目的並不在於研究中國形象在德語世界的發展史，而是預設「德語之中國哲學研究」是存在的，而且對漢語的中國哲學研究者仍具有參考價值。計畫首先便獲得消極的成果，即證明此一預設是錯的（至少難以成立的），因為「德語之中國哲學研究」此一領域嚴格來講仍未存在，反而有待建構。但從另一角度觀之，計畫的進行過程又證實原先的預設是對的，因為透過書目的蒐集、摘要和書評論文的撰寫，以及與德文組成員越來越密切的討論和合作，「德語之中國哲學研究」的研究領域逐漸以原先沒有預期的方式浮現：我們在德語哲學與漢語哲學之跨文化動態的研究中，發現富有潛力的另類方向。在此過程中，書目的蒐集屬於基礎工作，但從當代跨文化哲學的角度而言，必須促進歷史性的分析及創造性的發展。本專輯乃集合四篇與德語儒學研究相關的書評論文，來初步展現此一可能性。



五、儒學研究的例子

第一篇書評論文是針對哲學家沃爾夫 (Christian Wolff) 在一七二一年所發表的《關於中國人之實踐哲學的演講》。此演講代表十八世紀歐洲學者對「中國哲學」的強烈關注。將此文納入「德語之中國哲學研究」的範圍，並非理所當然，因為沃爾夫的演講是以當時的學術語言拉丁文所發表的。不過，沃爾夫在十八世紀積極推動德語的哲學書寫，而成康德及後來的一系列德語哲學家的先驅。演講的德語翻譯也已在一七四〇年出版。Gregor Paul 的討論特別著重於德意志啟蒙與儒家研究所產生的積極互動。換言之，在當時的特殊歷史情境下，在啟蒙對基督教教條的批判中，儒家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在「中國哲學」的正當性問題仍爭論不休之際，沃爾夫在十八世紀如此理所當然地使用「哲學」及「哲學家」來探討儒家學說，著實令人驚訝。依此，沃爾夫對中國實踐哲學的接觸，在今天也具有哲學意義，因為他指出德語世界儒學研究的重要線索，即特別強調儒家的非宗教特質，以及由啟蒙和批判哲學的角度來探索儒家的方向。在德國的漢學／哲學界中，Gregor Paul 和羅哲海 (Heiner Roetz) 則是此一線索的主要代表。

眾所周知，在沃爾夫之後，歐洲對儒家的認知經過了徹底的轉變。從康德以後，德語哲學不再以平等對待的方式探索中國的哲學。在此脈絡下，德語哲學與漢語哲學的互動關係發生嚴重的斷層。就德語的儒學研究而言，要等到二十世紀初魏禮賢 (Richard Wilhelm) 及許多其他學者所做的翻譯和解釋工作，一種新的互動關係才逐漸成形。魏禮賢在法蘭克福所建立的「中國研究所」便以文明對話和互動為目標。令人遺憾的是，魏禮賢在一九三〇年過世之後，中國研究所便落入納粹時代的政治風暴而逐漸沒落。直到一九七〇年代，德語的儒學研究才重新建立較為嚴謹的哲學趨向。

第二篇書評論文乃探討相關的重要案例，即是葛拉福神父 (Olaf Graf) 的《道與仁》。就此馬愷之指出，葛拉福的比較哲學論述在一九七〇年代來得過早，並沒有獲得應有的重視，以致今天被德語漢學界所忽視。葛拉福的比較進路集中於多瑪斯·阿奎那與朱熹的比較。沃爾夫和葛拉福雖然對儒學的探索相距甚遠，但兩者卻具有延續性的觀點，即認為儒家倫理學的建構可免於宗教的或形上學的基礎。換言之，兩者對儒學的討論都奠基在形上哲學與非形上哲學的對比之上。

第三篇書評論文也觸及相關的問題。一九九〇年代德語與法語的張載研究，都



強調對張載哲學的探索不應該從形上學的角度來進行，而應突顯儒學氣論的非形上學及非二元論的意涵。相較於此，第四篇所論及的德語牟宗三研究乃有助於展現德語之中國哲學研究與漢語之德國哲學研究之間的弔詭關係。倘若德語的儒學研究通常強調儒家思想的非形上學特質，那麼牟宗三反而企圖透過康德研究來維護（甚至建構）儒家的道德形上學。在此過程中，康德批判哲學的啟蒙色彩受到忽略，因而德國學者對牟宗三的評論，經常指責他扭曲、甚至嚴重誤解康德哲學的主要意義。針對此一評論，施益堅提出反思，並呼籲對於牟宗三的研究應當擺脫牟氏是否正確理解了康德的問題，反而更要正視其哲學的「混血性」，以確認當代儒學與當代哲學在那一些問題上有產生對話的可能性。

六、後 記

在進行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有關外文中國哲學研究的計畫時，工作從原初的摘要撰寫，逐漸擴展到探索德語之中國哲學研究的歷史困境與當代出路。在此過程中，德文組集結了許多成員一同參與摘要及書評論文的撰寫，並在計畫構想上提出許多反省意見。筆者在此要特別感謝過去幾年來協助此計畫進行的學者：李明輝、宋灝 (Mathias Obert)、谷心鵬 (Volker Heubel)、林維杰、施益堅 (Stephan Schmidt)、施維禮 (Wolfgang Schwabe)、馬愷之 (Kai Marchal)、康特 (Hans-Rudolf Kantor)、蕭豫安、鍾振宇。在書目的蒐集和整理方面，特別感謝谷心鵬花了近三年的時間，在德國的圖書館、書店及二手書店蒐尋相關資料。在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與東吳大學「中國哲學（外文系列）資料中心」的配合之下，東吳大學已購買了表列書目的部分書籍，而且谷心鵬也幫忙購買及複印絕版書籍和大量的期刊論文（此資料在東吳大學圖書館可參考或借閱）。此外還要感謝 Helmolt Vittinghoff 教授提供他有關德語漢學界的博士論文和教授資格論文方面的資料，以及他所蒐羅有關西方之古典中國哲學研究方面的豐富書目（參閱 Helmolt Vittinghoff, "Recent Bibliography in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28.1/2, 2001）。書目最後的編輯卻是料想不到的困難，不少細節問題無法透過網路資源解決。在這方面筆者對施益堅、施維禮、宋灝和谷心鵬的耐心協助特表謝意。若書目仍有錯誤或有所疏漏之處，敬請不吝指正。本專輯的內容屬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以外文撰寫之中國哲學研究論著之中文摘要」計畫德文部分的成果。筆者感謝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同意在此以專輯的方式呈現之。

